

王石波先生 纪念文集

王石波先生纪念文集编辑组 编

CTS
FURNISHING & MATERIALS
中南出版传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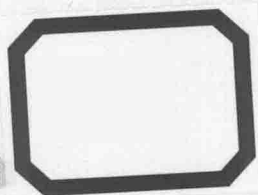


岳麓書社

王石波先生 纪念文集



王石波先生纪念文集编辑组编



编辑组成员: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丁放鸣 王大年 王小璜 李维琦
汪华藻 秦旭卿 谭 燧



 岳麓书社·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王石波先生纪念文集/王石波先生纪念文集编辑组编.

—长沙:岳麓书社,2013.4

ISBN 978-7-5538-0112-4

I. ①王... II. ①王... III. ①王石波(1919~2011)—纪念文集②诗集—中国—当代③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K825.46-53②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5912 号

WANGSHIBO XIANSHENG JINIAN WENJI

王石波先生纪念文集

作 者:王石波先生纪念文集编辑组

责任编辑:蔡 晟 赵爱平

特约编辑:丁放鸣

责任校对:舒 舍

封面设计:刘 峰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直销电话:0731—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岳麓书社淘宝网: <http://ylbooks.taobao.com>

2013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×1000 1/16

印张:20.25

字数:245 千字

印数:1—800

ISBN 978-7-5538-0112-4/K·341

定价:49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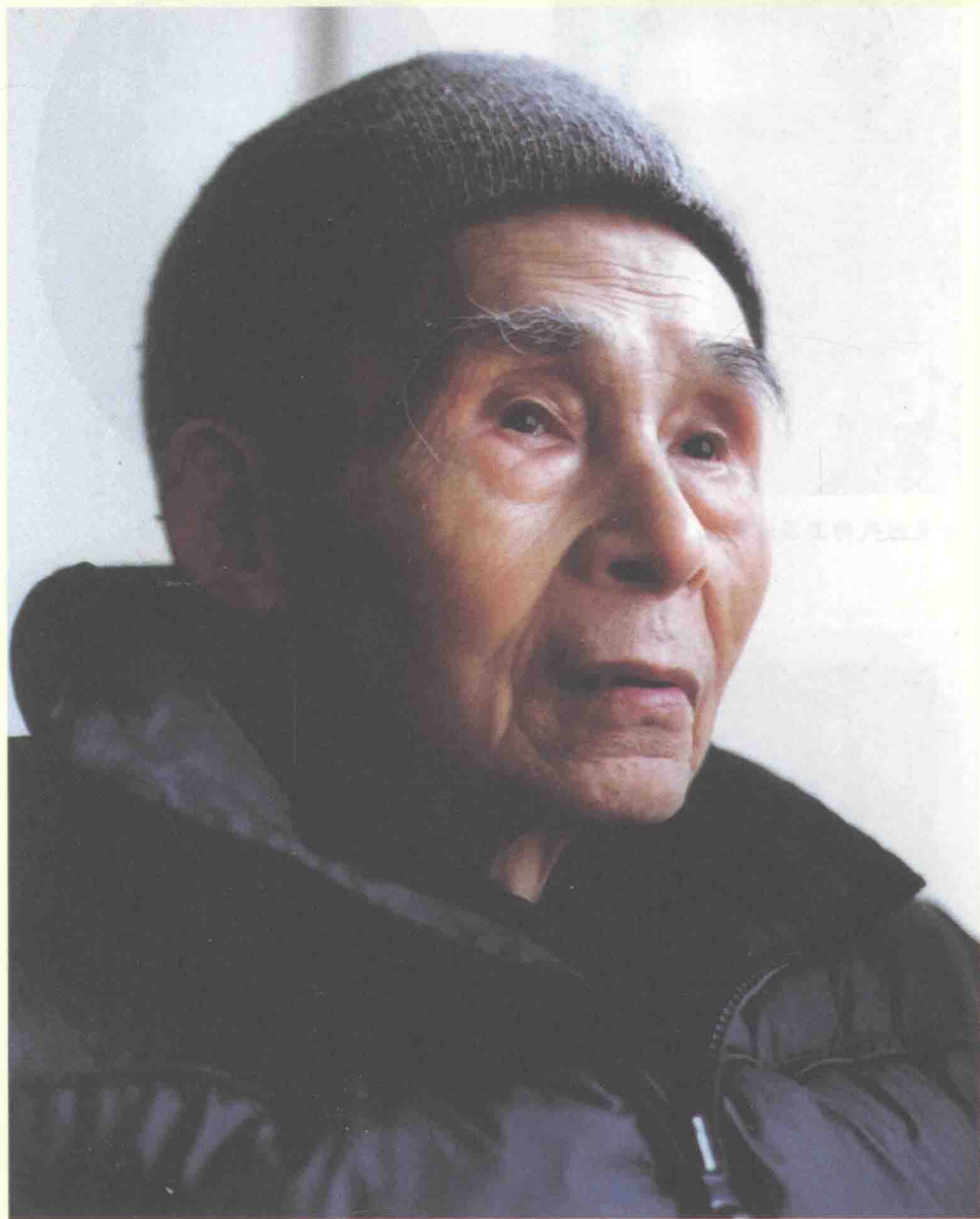
承印:湖南省星城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由蔣翼聘教授轉送我
李維琦老師送我

張國彥
二〇二三年
五月廿七日



王石波先生

(2006年12月李征军摄)



年青时代的王石波先生



王石波先生的夫人黄载淑女士



王石波先生与夫人、女儿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合影。



湖南大学中文系五三级师生合影。第一排左一李良志，左三萧波涛，左五汪华藻；第二排左一谭丕模，左二骆鸿凯，左三杨荣国，左四董每戡，左五魏猛克，左六马宗霍；第三排左一彭燕郊，左二龙鸿志，左三王石波，左四高子荣，左九郭锡良。



1990年登岳阳楼时留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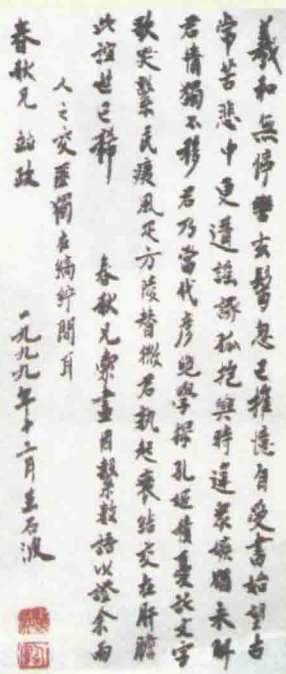
1997年，湖南省文史馆组织馆员参观彭德怀故乡时王石波先生的留影。



恭贺王石波教授八十寿辰

一九九八年十一月

1998年11月15日，由系主任李维琦教授主持，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为王石波先生八十寿辰举行庆祝活动。前排左五为王先生。



2006年12月摄于家中。

王石波先生题画诗手迹



2008年12月13日，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红楼庆贺王石波先生九十寿诞。图为座谈会场景，长桌首端为王石波先生。



2008年12月13日，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红楼为王石波先生九十华诞举行庆祝活动，第一排左六为王石波先生。

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王石波先生于湖南师范大学景德村家门口自己栽种的茶花树前留影。



上世纪九十年代初，王石波先生与好友在陈云章先生家中做客。前排左二陈云章，左三羊春秋，左四周秉钧，左五王石波；后排左四谭绪瓚，左五马积高。



2002年3月25日，湖南省委省政府领导与省文史馆馆员合影留念，前排左三为王石波先生。



王石波先生与女儿、女婿、孙女合影。



王石波先生（左一）与彭燕郊（中）、汪华藻先生小聚。



王石波先生（左二）与朋友及学生在杜甫江阁合影。前排左一黄修本，左三张鹤皋；后排刘鼎初。

序

李维琦

王先生诞生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之际，而卒于这个主义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之时。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、五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。而后就是安度余年了。

一

上世纪四十年代，中国的知识青年，除了误入歧途者外，大抵有两种可能的选择：一是参加革命，拯救祖国于水深火热之中；一是读书救国，成为一名学者，而以使祖国强大为其抱负。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。但也有天赐其幸，二者得兼而有之。王先生就是这样。

王先生作为学者的知名度，是无待证明的。无需说他的教授头衔，也可以不列他各学科的成就。只举他受到学术批判一事，就可折射他在学术上的造诣了。当时省委宣传部长坐镇，兴师动众，以他作为省委宣传首脑可以调动的力量大举“讨伐”王先生的“修正主义”，倘没有足够的学术权威，其何以当之？王先生之能成为大学者，无疑是由于他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的积累之功。

王先生的革命活动在湖南解放前后，曾经特别引人注目。据也是民盟成员曾经做过基层组织负责人的秦旭卿教授介绍，王先生是湖南长沙民盟创始人之一。解放后，他作为民主青年的代表，曾在大专院校和知识分子群里有过广泛的活动，配合我党的



中心任务，有效地开展宣传教育工作。后来虽受过批判，但对党的组织毫无怨言，只认为是基层个别负责干部的责任（后面还要讲到）。直到晚年，八十多岁了，还曾亲口对我说过周礼的故事。周礼那时是地下党的省委书记。早在抗战时期，王先生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因故失去了组织联系，就向周礼诉说。周礼叫他与湖大某某同志联系，而后竟无结果。王先生言下之意，错过了机会，后悔莫及。王先生表示这个意思，是在我们党犯了“文革”这样的错误之后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显著下降之后，是在我党饱受来自多方面的诟病之时，尤其让我感动。我的老师既是饱读诗书的学者，又是坚定不移的革命同志，我感到风光。

二

上世纪五十年代我党的初衷，应当是改造旧社会，继而建设新中国。从1953年开始，制订了第一个五年计划，看样子是正式开始了建设国家的宏伟工程。与党的初衷相应，在大学教育方面，那里的共产党员，制订了改造旧系科、建设新的符合建设需要的新的学科的计划。解放之初，接收湖南大学中文系的共产党员谭丕模就是这样设想的。他意欲把湖大旧的中文系（实是国文系）进行彻底改造，使之中外兼备，古今兼长，史论兼具，让马列主义渗入课堂，并成为各科的指导。应当说，谭丕模是正确的。为实现这一设想，首先就要打破国文系学科单一的局面，于中之上，加之外，也就是说，亟需设立外国文学课程。可苦于没有外国文学人才。这时原本以小学和古代文学为专业的王石波先生，急组织上之所急，自告奋勇，改行教授外国文学，为改造旧系科建设新系科出力。组织上考虑到他的深厚的文学修养，以及他的美学、他的哲学和他的马列理论水平，相信他能完成任务，同意了他的转行申请。

1953年院系调整，湖南大学的基础文科理科部分独立出来成为湖南师范学院，谭丕模调北京师范大学。情况在变化，而对学科的改造和建设继续在进行。王先生所在外国文学学科，加进了新的力量。先生与他们一起，建设起了毫不逊色于中文系其他学科的健全的外国文学课程。应该公平地说，那时这个课程当是以王先生所负责的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为其中坚。在他编写的讲义中，普希金的诗体小说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的系列形象，赫尔岑的《谁之罪？》作为“问题小说”的显著特征，屠格涅夫《贵族之家》的诗意、《父与子》中的新旧两代的深刻矛盾，托尔斯泰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的心理描写和艺术成就，《战争与和平》广阔的社会背景以及深邃的哲理覃思，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《白痴》中那位公爵婴儿般纯朴、自然和天真等，组成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巨幅画卷。在炉火纯青的艺术分析中，贯穿一根红线，那就是列宁的文学批评思想，是《列宁论列夫·托尔斯泰》一书的基本精神。单就外国文学这一部分而言，王先生的劳作，完全达到了谭丕模先生的最初构想。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，王先生所教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课程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，王老师成了最受崇敬的老师之一，就是课程建设达标的生动的有力的证明。在这个意义上说，王先生实是改造国文系建设现代化中文系的有功之臣。

后来的年轻人，不明白王先生的劳绩，不了解王先生作为革命者的素质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。王先生逝世后，为了表示他对中文系的恋恋与感情，请求让他的遗体在系里一间可空出来的地方待上一晚，遭到了委婉的拒绝，这使他的学生们感到十分尴尬和遗憾。

三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大致上说来，是大批判的年代。当然，大批判也不是从1960年才开始。但如果说到大规模的、集中的、长时间持续的、其烈度是前所未见的大批判，说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事，想不为过。大批判实际上也是大打倒，大毁灭，大破坏，大撕裂，大摧残，甚至在一定范围内也就是大屠杀。

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，如果说他们没有不受批判、没有不受冲击的，也就太绝对了一些。没有受到批判的不是完全没有，如果有，那就是百分之一，千分之一，万分之一，天地间的幸运儿。当时有两大利器，一是阶级论。所有的人都属于一定的阶级。你是敌对阶级的人，批你整你，绝对正确。如果不是，那你有可能就是敌对者的代理人，是阶级异己分子，批你整你，也绝对正确。拿这个武器整人，还有漏网的，另有一个历史论，那就几乎可以网罗一切人了。除了少年儿童，还有小部分青年人，谁没有自己的历史？有了历史，就有了拖累。概莫能外。林彪坠机前，当是完人，否则怎么会选他做接班人？但他也曾怀疑过红旗究竟能打多久。远的说不尽，说近的。当过湖南师范学院校办公室主任的郭桢，抗日时他是山西某地敌后武工队长。他当过三次武工队长。当一次，队员全牺牲了。又派他组织另一次的武工队，并任队长。看起来他当是有着光荣的过去了。但不然，这段历史同时又成了他的拖累。因为审查者认为，队员都死了，只留下你一个武工队长，你队长一个人怎么会保得住？那一定是当了叛徒，于是被打入死囚牢房，几乎丧命。在那个时代，拿这两项武器可以横扫一切人，知识分子是个弱势群体，更逃不脱这两根大棒的打击。谁是打击的实际执行者？那些无历史拖累的人，学校在读学生，刚毕业的红色青年，欲进入知识阶层而尚未进入。

待到他们为两论所武装，进行了横扫之后，也就有了自己的历史及其拖累了。

由于大批判的周遍性，几乎涵盖了所有方面，蒙难的是整个中华民族，受伤害的是整个国家，个人大可不必因未被批判而庆幸，也可不必为受批判而沮丧，存在太史公那样的感觉。相反，应该看开一点，我的命运是与民族国家同步的，国家有难，我岂能幸免？但王先生是讲究气节的人，如他的墓门联所写：“山石嶙峋风骨”，对于1960年那次对他的大批判耿耿于怀。他以为当时某个当权者，把本不当指向他的矛头转移到了他的身上，怀着一股子相当的闷气。

外界的传闻也是有鼻子有眼。说湖大中文系转到师院中文系，有四位新锐，堪称未来的台柱，他们是“一中一外，一古一今”。“古”在反右中倒下去了，“今”在反右的持续中也倒下去了，那个当权的“中”，又伺机将“外”整了下去。于是成了一人独大。但是，这个“中”，却最终也倒在大批判形成的血泊之中，而且是四人中最惨的一个。说起来，还是王先生得以终其天年，以教授的身份享受国家厅级待遇而离休。所以说，“新锐”的栽倒，是不是个人的权术或阴谋所致，并不重要，关键是那个时代，是那个时代一些致人于死命的因素。我在《纪念王石波先生》一文中，把王先生受批判说成是不知何故，是突如其来，是莫名其妙，那只是当时一种感觉，到了后来，我似乎已明其就里，只是不知其真实与否。

约摸是1958年的时候，我们欢呼过两个主席的诞生。记得当时的公报里，用上了“腾出手来”作理论研究的话。事情过去了半个世纪，对于党史无所经历，而又只从有文字的党史里学习党史的人来说，那个“腾出手来”仿佛没有了下文。我以为是有，但我们不知道1960年以前，具体有哪些算是那个特定的理论研究的成果。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只有读苏联《政治经济学教